消失的手工金属雕刻与工匠精神(上)

◆ 刘源隆

新中国成立后,奖章、勋章的大量需求为手工金属雕刻,这一1856年在中国生根的古老工艺造就了生长的沃土。然而,每一种技艺都要与时代磨合。显然,在与便捷、快速的电脑雕刻对垒中,最后一批金属雕刻工匠败下阵。手工金属雕刻是否就此消失,还是在经历阵痛后获得新生?

■ 上海银饼——中国手工金属雕刻的开端

坐落在北京西部的某电脑数控雕刻机厂,每天都接待很多客户参观。去年12月,记者走进这家工厂的厂房,当时工人正在演示操作一台雕刻机,把设计好的3D图纸输入电脑,机器启动,透过机床的玻璃罩,里面的机械臂高速运转,不时还自动更换刀头。很快,一个云龙纹图案的模具就雕刻完成。在参观者们一片惊叹与赞扬声中,也有人发现了问题,雕刻出的模具虽然精微细密,但透视关系并不准确,显得并不十分生动。

如今这里的雕刻机已在全国广泛应用,它的迅猛发展,完全打败了一项古老的工艺——手工金属雕刻。

原解放军1202证章厂,这一曾经直属总政治部的工厂,自成立之初就承担着各类军功章的制作。原厂长周体良对于金属雕刻有着很深的了解,“电脑雕刻现在是大势所趋,它太便捷也太精细了,但是相比手工雕刻,总是欠缺一种韵味,无论如何都称不上艺术。”在他看来,从技术角度或许电脑可以替代手工,但是这一工种蕴含的“工匠精神”的传承缺失,却是社会的遗憾。

铁杵成针:工艺美术中难度之最

自明朝中叶,中国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催生了银两制度。但直至清代,这一制度一直不完善,各地银两成色质量标准各异,这就使大量的机器铸造的标准化外国银元得以在中国流通。

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清政府终于意识到外国银元在华自由流通侵犯了中国的“利权”,便开始仿效墨西哥鹰洋开铸银元。上海首先产生了地方货币银元——“上海银饼”。“上海银饼”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应用手工金属雕刻模具,再压制而成的。“可以看出上面的文字极其俊秀,笔锋犀利,这要求雕刻者拥有深厚的书法修养,电脑标准字无法达到这种境界。”

从此“手工金属雕刻”这一堪称雕刻中最难的工艺便引入了中国,此后它被普遍应用在钱币、徽章、军装等领域。

很多人会将这种工艺与“金属錾刻”混淆。前者的目的是剔刻出“模具”进行金属产品的批量生产,后者是在金属工艺品上直接进行敲打成型,而难度也就此产生。周体良说:“‘金属雕刻’的对象是钢,属黑色金属,‘金属錾刻’的对象是金、银、铜等有色金属,钢的硬度比金银铜要硬多了;而且雕刻需要在钢材上剔除出图案,所用的工具得比钢还硬,錾刻是用錾子敲打软金属,工具要求较低。像木雕、核雕用刀子就能刻了。”

而如何制作所用的錾子也就成了金属雕刻第二大难点。

金属雕刻需要的錾子得是合金钢材,在旧中国,物资短缺,没有标准钢材的生产供应。“当时的老工匠们,一般都去废品市场买旧弹簧,将其锻打、拉直,做成各种形状的錾子。当时也没有砂轮,打磨弹簧钢,需要在磨刀石上一点点地磨,真正是‘铁杵磨成针’。”那一个工匠要打磨多少把錾子才能雕刻呢?“至少得有上千把形制各异的錾子才能保证在钢上雕刻出各种图案和文字。光是制作錾子一项,其过程就极为漫长,往往要靠师徒几代人的积累。”

此外,这些錾子中除了几十种基本形状是标准的,其余都要工匠发挥想象力,去发明新的錾子,这样才能雕刻出新的图案。老话讲“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可以说一个工匠发明的錾子种类越多,它的手艺也就越高。

学而不厌:铸就经典的“三大勋章”

自1856年手工金属雕刻在中国生根,随后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直至新中国成立,奖章、勋章大量的需求给这一工艺造就了生长的沃土。

清光绪年间,诞生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勋章——双龙宝星勋章;北洋政府时期的宝光嘉禾勋章、文虎勋章;国民政府时期的青天白日勋章、采玉大勋章等等这些工艺精湛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不同时期的最高荣誉,这也让从事这一行当的工匠们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行业工匠,“当时这些工匠们都在银楼、印铸局、军工企业里工作,所有工匠中只有他们在工作时不穿工作服,而穿着丝绸的大褂,吃饭也是和掌柜的同桌用餐。”

金属雕刻工匠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旧受到极大的重视。50年代中期,国家根据这些工匠手艺的高低,为他们评定工资和级别。第一名陶炳衡,工资426元,跟毛主席工资相当,可以说是手艺人里的顶级。第二名恽金秀,工资385元。第三名刘振均,工资102元,而当时普通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多元。

“这些顶级的工匠,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一直是单位里地位超然的人物,这就造成了他们技术越高脾气越大。”周体良感慨道,“他们非常不好相处,领导都得捧着他们。”

但这些牛脾气的人,在面对不了解的领域,却显现出极大的谦逊。1950年,为满足新社会对于美术方面的需求,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供应社。工匠们得到和美术界大师一起工作的机会。供应社设肖像股,吴劳、周令钊等为首的画家,绘制肖像油画;塑造股,包括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祜、参与国徽设计的雕塑家郭效儒制作各类雕塑;还有就是徽章股,由金属雕刻世家出身的刘振均从事模具雕刻工作,他们之间通力合作、相互学习为新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55授勋时的“三大勋章”。1951年,中国工业设计的奠基人郑可,带着当时最先进雕刻设备从法国归国。1952年,国家将这些机器交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徽章股和红旗证章厂,联合成立北京证章厂。1953年北京证章厂便开始着手制作“三大勋章”。

“‘三大勋章’由周令钊、常沙娜、张光宇等美术大家设计,郭效儒塑版,郑可的徒弟伍仕汉手工机雕模具,刘振均与恽金秀手工雕刻修模才得以呈现。”原北京模具厂雕刻工匠、刘振均的弟子刘燕群根据师傅的回忆说道,“这一由美术家与工匠的合作,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三大勋章’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

一生一首翰墨诗
——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

二十二、化古为新

曾有学书者问周慧珺:“书法创作中什么环节最重要?”她讲了则有趣的故事:“高速公路上有两辆车因为些微的擦撞,两位驾驶员一言不合,就在路边打起架来。这两位驾驶员,一位是普通人,另一位则是知名空手道冠军。交手不到数分钟,结果出来了,空手道冠军输了!许多人因此大惑不解,有人道出了空手道冠军输的真正原因。原来空手道冠军有个习惯,就是不打头部,腰部以下也不打。可是普通人没有学过空手道,因此,没有受到制度与规定的束缚,直直一拳就击在空手道冠军的鼻梁上,冠军就此倒地不起。”

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说明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书法创作亦然,不要被技法所约束,要充分发挥自己想象的能力。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矣。有坚实的基本功,熟练掌握运笔技法后,就要有自己的想法,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勇于创造自我的个性。

周慧珺的作品正因为有了创新而给人以强烈的时代精神,这是一种毫不做作的、以自己厚实的功力和充溢在笔尖的感情所作的“创新”,一种不用高声叫喊也能起到振聋发聩作用的“创新。”在对待创作的问题上,周慧珺有她自己的理解。她认为个性强烈的艺术家,风格的形成一定会早于一般人,用心搞艺术的人必然会把自己的综合素质体现在她的作品里,形成其特殊的风格。但风格会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需要时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同于戏剧中的“变脸”,可以在瞬间完成。周慧珺本人创作生涯的嚆矢也是在她苦苦摸索书法曲径四十余年后才有所领悟而形成的。

清代诗人赵翼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人生逾百年不易,数百年之事更是难料。周慧珺对于书法,从蒙昧到热爱并为之倾注一生的心血,走过了一个不短的过程,她在自序《书道苦旅》一文中曾为此作过叙述。尤其是在碑帖稀少、书法理论尚处在讨论技法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造”、“流行”等词语对周慧珺来说闻所未闻,遥远得如望星空。周慧珺不知“创新”,无意“流行”,却在不久以后成了“创新”与“流行”的代言人。这种不期而工的心态使得周慧珺的书法作品中始终充溢着理性与激情的完美结合,使她的作品丰满并具有立体感。她的墨迹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与冲击,跳跃腾挪的节律、出乎常人意料的造型,均使人过目不忘。她的笔下所表现出的粗重与空灵、厚实与淡雅,无不说明她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入了自己的创作境界,纵横捭阖。

综观中国书法发展史,千百年来能在历朝历代占一席之地的大书家,没有一位不是“创新”的典范。李北海高叹:“似我者俗,学我者死。”苏轼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诀也。”黄庭坚有言:“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作真。”石涛名句:“笔墨当随时代。”其实,创新并非简单地否定前人,而是一种延展与发扬。

周慧珺本就是一个敢于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进取的书法家,在她的心目中碑帖合一既是理想也是目标。所以,她才会毅然而然地做了自我否定,把自己的视野和触角深入到北碑之中,作品给人以刚强雄浑的面目。同时,在内质中还不时隐隐地透露出妩媚的意味。这就说明在她的心目中,书法的创造是书法发展生生不息的源动力所在。她对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表现手法极为关注,会长久地驻足观看。她始终认为书法创作本来不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而是以表现自己为最终目的的。

周慧珺自己也曾将书法的创作实践过程形容为一张心电图,她说:“头脑中的想象、构思,一般很难与实际创作求得一致。一旦将构思好的东西写于纸上,往往会变成与想象完全相背离的作品。今天,我们追求高深莫测的激发和无限的精神性,主观希望取得高雅的结果,而实际是很难做到的。书为心画,书法创作能把作者的全部姿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作品就是作者的生活经历、思维行为的记录,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展示明天的生活方向,这应是作者的一张诊断准确的心电图。”

经历了“与古为徒”“出帖入碑”之后,周慧珺终于“化古出新”,终成一家面貌。

鸦片战争始末

司马牛

9.中英南京条约

正当英军攻占吴淞的时候,又有兵船十五只、兵士二千五百人由印度赶到长江口增援,这使英军兵力大为增强。英军在派船多次探测长江水道之后,于6月23日退出上海,7月6日起自吴淞口沿江西驶,8日过常熟福山口,10日过江阴鹅鼻嘴,13日过扬中山关,15日已进抵镇江江面。

镇江正在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上,是当时南北交通的要地。这里也有旗兵驻防,临时又调川、鄂两省绿营兵增援,共计兵力五千余人。和乍浦情形一样,旗兵副都统海龄拒绝外来援军入城,令在城外作战,自己率领旗兵一千余人守城内。英军于7月21日上岸进攻,在首先击退城外守军之后,攀梯攻入城内,旗兵到这时不得不拼死应战,结果死伤五百余人,海龄自杀,英军也死伤一百八十五人,镇江只经过几小时战斗就告失守了。镇江对岸的扬州,守兵只有数百人,防务极为空虚,地方绅商自动筹银五十万元送交英军,作为购城费,得免战祸。

镇江失守的消息伟到北京,道光帝更感惊慌,急忙给予耆英、伊里布、牛鑑等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再令他们赶快向英军求和,并明说只要英军停止进攻,所有前在天津所提各项要求都可承认。

镇江过后,英军于8月4日驶抵南京城外的下关。南京在当时是仅次于北京的重要城市,有将军德珠布率领旗兵三千人驻防,临时又调鄂、赣等省绿营兵四千人来此,但牛鑑认为“守御殊无把握”,只有求和一条路好走。

8月9日,英军在南京上岸准备攻城,形势紧张万分,伊里布首先赶到,耆英也随后赶到,当即会同牛鑑向英军接洽停战议和。8月12日,璞鼎查提出和议条件,限定须一字不易地接受,如不接受,即行攻城。14日耆英等答复全部接受,英军停止进攻,退回船上。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8月29日,清朝政府全权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鑑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停泊南京下关的英船康瓦里斯号(Cornwallis)上签订南京条约,签字时船上升起中英两国国旗,并鸣炮二十一响。

南京条约一共十三条,它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一)由清朝政府赔款银二千一百万元给英国;其中包括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内扣除扬州赎城费五十万元),鸦片价款六百万元,洋行商人欠款三百万元。第一期先付六百万元,其余限四年内分期付清。

(二)清朝政府永远割让香港全岛给英国。

(三)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口岸通商,允许英人携带眷属居留和自由来往,并设立英国领事馆。

(四)所有进出口货物关税税率,由中英两国协定。又进口货物既经缴纳关税以后,即允许中国商人自由运销内地,沿路不得加重征税。

(五)中英两国官员文书往来,一概用平等式。

(六)在清朝政府付清第一期赔款以后,英军即行撤退;但留驻在定海和鼓浪屿两处英军,须等到全部赔款付清和通商口岸开放后再行撤退。

南京条约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通过南京条约,清朝政府除了割地赔款以外,还承认英国侵略者得在中国享受各种特权。就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并取消以前在广州实行的洋行专利制度,从此英国资产阶级可以在中国市场自由销售他们的商品,任意扩大他们对中国的贸易;这样就摧毁了中国这个封建大帝国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基础,破坏了中国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第二,中英两国协定关税税率,中国不能自由加减,这就使得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完全失去保障,而英国资产阶级却可以顺利地在中国实行不等价的交换。英国侵略者就是这样用不平等条约束缚中国,一步步地逼迫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的道路。

再有,中英战争本因鸦片问题而起,但南京条约对鸦片问题不提一字,战后鸦片公然无税进口,而且输入数量仍然年有增加,如1850年输入达五万三千箱之多;因而烟毒流行更甚,白银外流也更甚。